

陈先书 张允熠 主编

Wu
shenlun

Yu

无神论

与科学精神

Kexue
Jingshen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前 言

把无神论与科学精神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对象来研究应该说是一个新课题。无神论思想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着悠久的传统，它是唯物主义哲学和科学精神的生长点，本书旨在寻觅无神论思想和科学精神发展的过程，剔析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阐明近代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在科学精神的层面上所达到的最高的统一，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是当代的科学精神。这一领域的开拓性研究，对于确立民族精神支柱、坚定科学信仰和高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识别伪科学和反对邪教侵蚀，无疑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史前时期无神与有神观念紧密交织在原始思维和原始宗教之中，由于受生产力和人类认识能力的制约，这一时期人类关于有神还是无神的观念只能称为无神观而不能称之为无神论。本书首先论述了人类早期的无神与有神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伴随着人类从蒙昧、野蛮一直走进文明时代的。在此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无神论基本上经历了三种形态，即古代素朴的无神论、近代无神论和科学无神论。就宗教来说，中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中国夏、商、周三代以及此后的本土宗教从来没有摆脱原始宗教的特点，也始终没有发展出像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的正统宗教来，中国文化中的“宗教”二字，与西文的religion也有实质上的差异。承认惟一神的存在和创世说，通过祈祷和赎罪以使灵魂复归上帝（惟一神），这是亚伯拉罕系三大宗教的一个最基本的轴心理念。反观中国宗教，恰恰缺少这三个最基本的东西，中国儒教和道教都缺少创世说和“原罪说”，缺少人格化的至高无上的惟一神，信徒们

也不需要经由忏悔之路通向天国。中国宗教以敬天祭祖为特点，它的世俗性远远大于它的彼岸性，其超越性并非存在于冥冥之中的天国，而存在于似乎是遥遥无期的未来人间天国或大同社会，这样就形成了精神信仰上的来世主义与现世主义、意识形态上的伊甸园与乌托邦。

中西文化之间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异造成一种奇特的现象。西方在希腊时期有着卓越的无神论思想，但此后却被基督教学或曰希伯来意识统治了一千多年。相比之下，中国的无神论思想形成在殷周之际，此后两千多年间中国的主流文化都表现出一种世俗的和无神的价值取向。所以，文艺复兴以后的近代西方学者如法国的伏尔泰以及后来的德国哲学家都认为中国哲学就是无神论或自然神论，谢林甚至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惟一不信宗教的民族，黑格尔却看到了在中国民间迷信和巫教十分盛行，他凭着哲学家的敏锐指出这是中国人缺乏高层次精神生活的表现。然而，历史的发展常常表现出一种悖论，基督教民族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迎来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呱呱坠地，而中国的科学却一直表现出原始古朴的形态，以至于19世纪中叶以来不得不向西方学习。

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在现代文明大道上前进的两大精神动力和思想潮流，在经受一系列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产业革命和英法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后，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以理性主义的形态汇聚起来，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高形式的科学精神，即马克思主义。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世界历史意义时指出“它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其中包括古代希腊和东方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而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直接思想来源和文化背景则是19世纪英德法三国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19世纪的三大发现即

进化论、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以及细胞学说，成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重要思想资料和科学依据。恩格斯曾经指出过，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现代唯物主义也会不断地改变它们的形态。同样，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科学无神论的日益深入人心，有神论也会不断地改变它们的形态；主流文化在发展，亚文化也相应运作；正统宗教存在一天，邪教也会与之抗衡一天。社会的发展正是如此，随着“善”的进化，“恶”也在进化。但是，真理终要战胜谬误，正义终要战胜邪恶，这是历史进步的大趋势。

时下，由于伪科学和邪教的肆虐，使我们更加感到科学精神的可贵，什么叫科学精神？只要我们重读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就不难发现在这两位人类伟大的思想巨匠那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高度统一的，它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是彻底的、科学的无神论，是迄今为止最高形态的无神论。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和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未来，一切全靠人类自己，人比“神”要真实得多、高贵得多。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是一种求真、求实、求善、求美的精神，体现着人类价值的最高实现即最高的理想和人生信念。再次，马克思主义作为最高层次的科学具有生生不息的创新意识，创新就是马克思主义最强大的生命力。创新是创新着的人和人的创新，是人类在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上不断追求的价值曲线，这种曲线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不可能终结真理，而是在不断地吸纳当代文化和科技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发展真理。最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包括着人文意识的科学精神，它是识别一切伪科学和新神学的试金石。只要我们翻阅一下当年恩格斯对“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的辛辣嘲讽，我们就会发现在对待一切伪科学和新神学的识别、揭露和批判上，革命导师早已给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本书共分十章，前四章主要写无神论和有神论这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的产生、发展历程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表现形态，以及无神论、有神论与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之间的关系。在第四章中，还重点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文化和自然科学背景，阐释了一些过去没有人提出的见解，是否成熟，以供读者讨论。第五、六两章重点论证了科学无神论与“科学有神论”这两个具有创新意义的概念，重点阐明了科学精神的基本特征和内涵，对伪科学进行了界定和剖析。第七、八、九三章主要对宗教和邪教进行分析，指出了二者之间的某些相似之处和本质区别，并对包括“法轮功”在内的当代邪教现象进行了较为详备的剖析，阐明了我国的宗教政策和防范邪教的措施，同时介绍了世界各国反邪教的情况。本书的最后一章对邪教和伪科学产生的现实土壤和思想根源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强化民族精神支柱是抵御和铲除邪教危害的根本举措。

由于诸多原因，在拟订写作提纲时感到这是一个难度较大的课题。尽管我们坚持以学术性、理论性、科普性和可读性为本书的编写宗旨，但由于时间仓促，资料匮乏，其理论深度和整体架构多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加之这一课题的现实性极强，我们与“法轮功”的斗争还在继续，在许多方面很难满足读者的需要。出版之后，我们一定虚心地听取读者的反馈意见，以供有机会再版时进一步完善。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人类早期的无神论思想与宗教观念	1
生产实践与原始崇拜	1
早期的无神论思想	23
第二章 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	42
何谓世界观	42
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	53
第三章 无神论与旧唯物主义	67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	67
近代机械唯物主义	81
第四章 无神论与辩证唯物主义	93
辩证唯物主义产生的科学文化背景	93
科学的世界观	110
第五章 科学无神论与新神学	120
近代科学与科学无神论	120
科学无神论与“科学有神论”	137

第六章 科学精神与伪科学	146
科学精神的实质	146
伪科学的实质	160
第七章 宗教与邪教	171
宗教与邪教的含义	171
宗教与邪教的不同特征	180
第八章 法轮功与邪教	192
法轮功的特征与实质	192
法轮功的危害性	204
我国政府对待邪教的政策	212
第九章 世界邪教概观	219
世纪末世界邪教概况	219
世界各国对待邪教的态度	231
第十章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强化民族精神支柱	240
邪教迷信产生的现实土壤	241
“法轮功”事件的再反思	249
后记	260

第一章

人类早期的无神论思想与宗教观念

有神的思想或宗教观念起源于远古人类的原始思维之中，最初是以尊崇自然神和宗祖神的观念与行为表现出来的。无神的思想产生相对较晚，它是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人类智力的提高，在宗教迷信失去灵验作用后对神产生怀疑时萌生的。但是，这只是在逻辑上的推导。按照辩证法来说，有神与无神是一对矛盾，取消了矛盾的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存在了。应该说，它们是同一观念胚胎裂变出来的针锋相对的两种思想体系。

我们在追述人类文明胚芽形成的过程中，洞察和体悟宗教观念与无神论思想产生的历程，这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人类不是神创的、而是劳动产生的这一结论的真理性；有神与无神、宗教与科学的冲突也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有史俱存的。

生产实践与原始崇拜

古人考虑最多的方面是天人关系和形神关系的问题。天人关系的主要含义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类的早期，由于认识能力的幼稚，便把人与自然纠缠在一起来看待，甚至于认为人本身也和动物一样，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只要、也只能从人与自然的紧密关系上来考察人对自然的认识，从中反

思出人对自身自然的认识，事实上，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的层面。

人类的起源及精神发展

关于人类的早期情景、人对自己周围世界的认识以及人对自身的认识，都保留在各民族古老的神话当中。神话作为人类古老艺术的文学珍品，尽管有些被收编到宗教经典里面，但它与宗教具有本质的不同。神话是对人类现实生活的艺术夸张，表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现世精神，而宗教纯粹是一种对神的信仰，体现了一种消极的来世主义。世界是怎样形成的？我们人类的祖先究竟从何而来？这是古人在一段非常漫长的时期对外界自然和自身自然认识上的一个重要谜团。在西方，《圣经》中说上帝先创造了宇宙，然后又创造了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中国，传说中有女娲造人的神话，《太平御览》上说：“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絙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絙人也。”这显然是母系时代的传说。另外母系时代中的其他女性如羲和、西王母等，也常常被说成是万物及人类的创造神，可见当时妇女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起着主要作用。这些神话传说多少也透露出远古社会的一些真实信息，比如大洪水、母系社会，等等。

可是到了近代，进化论提出了人类是由古代的一种灵长类动物演变而来的观点，后来考古学家发掘出许多古代遗留下来的猿人化石，使我们从实证科学角度上获得了人类是由古猿进化而来的确凿证据，并且推算出从森林古猿进化到现代智人大约经过了1400万年的过程。恩格斯对进化论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在自己的著作中深刻地论述了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从而填补了人类起源过程中的一项空白。

现在,结合科学考古资料、古代神话传说和古代文献,我们可以大体上了解到人类起源及其精神或意识发展的过程,知道人类进化最根本的条件是劳动。劳动不仅维持了人的生存,锻炼了人的大脑,扩大了人的思维和认识,改造了客观世界,而且,“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①。因此,我们在介绍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最初认识时,就必须以“劳动”(生产实践)为线索,因为劳动的过程就是人类发展的过程,也是人们不断认识自然和自身的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②。劳动是怎样开始的呢?它又是怎样把猿变成人的呢?让我们走进人类进化的历史长廊中作一番巡礼吧!

人类蒙昧时代的精神探险

地球的早期雨量充足,气候温暖,森林茂盛,古猿聚集在森林中,主要靠采摘野果为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充足食也”(《韩非子·五蠹篇》)。但后来随着气候等自然环境的变迁,久住树上的古猿陆续向森林低湿处迁移,并渐渐搬到地面上生活。

这样,它就要昂头摘野果,低头挖掘能吃的球茎,还要用石块抵御猛兽的侵扰,渐渐的,手脚有了分工,并成了直立的猿人。恩格斯指出:直立,行走,“由此就迈出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③。

食物是生存的第一要素,而劳动又是获得食物的第一要素。人类的精神发展尚处在孩童时代的第一个认识,首先就是从扩大可食物的范围开始的。当他们饿极之时,在河海边看到许多小鱼虾,便试着吃下去,虽然生食腥味难咽,却可止饿解渴,便渐渐把各种水族拾来尝之,其中吃的蛤蜊很多,贝壳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4页

积如山，现在人们常常在海滨附近发现的“贝冢”，就是上古遗存之一。

人类在孩童时代的第二个认识，就是对集体生活和集体力量的需求。那时生活在山上的人们，看到老虎猛兽等吃小羊、小兔，便去尝尝残剩的部分，发现不仅能充饥，而且味道也很好，于是便知道除果子外，还有许多东西能吃。但是仅靠两手捕捉野兽十分困难，于是便学会了由许多人围成圈，堵住各个方向出口不让动物跑脱的办法。遇到猛兽袭击时，人们渐渐学会了搬石块、挥木棍合力击打的方法，这样人类意识到了集体的力量和智慧，便开始依仗群聚来生存。

分吃动物时，人类开始学会用石头砸割骨肉，又渐渐知道尖的石块更锐利。当石头被无意撞击破裂开来时，他们却发现这种石块更锋锐，以后便学会了自己打制合适的石具——使用和打造石头工具，这是人类精神在早期认识史上第三个伟大的发现。

有时遇到雷击起火，或是火山爆发，人们非常恐惧，四处逃奔，但当他们后来战战兢兢地回来，闻到许多动物的焦香味时，便尝了一下，发现比生的好吃许多，还发现猛兽们都很怕火，而且火还能带来光明。这样，知道了火的作用，便开始学会去保留火种，并渐渐学会控制了火。在距今约170万年的“元谋猿人”遗址的地层中，就发现了大量的炭屑和灰烬，这是世界上发现的最早人类用火遗迹。学会使用火，这是人类精神在早期认识史上的第四个伟大的发现。

但火种保存很不容易，往往会被雨水熄灭。后来他们无意中发现一种黑色石头，一经击打，火花四射，燃起枯叶；还有人发现用尖锐的利器钻木发热也可以取火，此时，人类已发展到了传说中的燧人氏时代。生活在四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就已经学会了初步打制石器，并已学会人工取火。在“北京人”生活的洞穴里，有厚达六米的灰烬堆，里面还有许多被火

燃过的兽骨和石头。从无火的石头、无火的木头里取出火来，说明人类早期对自然的认识已经出现了质的飞跃。火的发明，使人们吃到了熟食，缩短了消化过程，增强了体质，扩大了食源，增进了大脑的发达，提高了智力，人们可以突破自然条件的限制，在更大范围内活动和生活，这一进步“直接成为新的解放手段”^①。除了人的因素之外，任何时代生产力的标志都是以特定的生产工具为代表的。或者说，人类社会的进步、文化层次的高低在物质形态方面以工具的使用和革新为标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用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器、铁器、蒸汽机、电动机、原子能、微电子代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的原因之所在。火，应该说是人类在原始社会使用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在与猛兽的搏斗中，人们又逐渐地发明了新的工具，由石块到石刀到棍棒到骨针，再到把木棒前捆上尖石，做成石枪。人们带着这些新式武器，纵火逐兽，投叉击鱼，下水抓鳖，上山打虎，从而大大增加了食物数量。于是饱食的人们在洞穴中围火而坐，猛跳狂舞，口中呼咕作声，表演打猎时的快乐情景——这表明了人类对自身能力有了进一步的确切认识，并由此产生自豪感。而音乐、舞蹈也从此诞生了。他们还把这些情景刻在石壁上，涂上偶然发现的赤铁矿粉，这就是最古老的岩画——劳动、创造、娱乐、审美，人类原来就是在这种其乐融融的“伊甸园”中悄悄长大，而并非出于“上帝的乐园”，人类的一切精神生活都来自于劳动，而非神赋！

在开拓食物范围的同时，人类也开始学会穿衣——由披挂树叶遮体，到用骨针连缀兽皮，再到麻纤维的发现。这样，人类对自身和大自然的认识获得了新的飞跃，向着文明不断迈进。如距今大约一万八千年的北京猿人的遗址龙骨山上，生存着一群“山顶洞人”（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他们的体质形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0页

几乎同现代人一样)，其遗址上发现有一根骨针，针头尖锐，针眼窄小，手工磨制，十分精巧，反映出山顶洞人已有较高的钻磨技术。

人类野蛮时代的认识拓展

大约在山顶洞人时代以后的上万年间，人类发明了石器中心钻孔技术。他们在石刀中心安装上木棒，成功地制成了一柄坚固的石斧，并渐渐地知道把石斧磨得尖滑，可以更加锋利。另外，他们在火中烧烤裹有小动物的“泥块”时，学会了制陶技术，从而发明了陶器。钻孔和制陶是新石器文化的主要特征，它表明人类文化又有了一大进步，这是距今约1万年的事，从此，古老的中华大地进入了黄河文明的时代。

关于对宇宙起源的认识，在我国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神话：在最古之时，天地初分，有一个叫盘古的人，顶天立地于天地之间，天每日高一丈，地每日厚一丈，盘古也每日长了一丈。经过了一万八千年，盘古长得极高大，他的呼吸成了风，他的声音成了雷，眨眼为闪电，泪流为江河，天晴是他的喜悦，阴雨是他的愤怒。当他死时，头变山岳，眼睛变为日月，毛发变成草木，脂膏变成江海。这个开天辟地的神话当然不是事实，但却反映了早期人类试图与大自然一比高低的可贵精神，也反映了人的身体与自然本来就是融为一体的，这是后来哲学家“天人合一”思想的神话来源或画面诠释。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我国至今还流传着另一个神话：亚洲东部一带火山爆裂，猛烈异常，森林燃为灰烬，山石流成五颜六色的溶液。人们都非常害怕，伏羲的妹妹女娲前去察看。当火山结束时，人们非常奇怪，为何女娲走一趟就平静了呢？看到地上的火山灰和彩石，他们想：这肯定是天塌了，是女娲用火山灰塞住海水，炼五色石补好了苍天。这个故事辗转流传，成了一个美丽的神话，它和盘古开天辟地一样，都反映着人类征服大自然的斗争和克服自然灾害的意愿——人在伟大的

自然——“天”的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天崩可“补”，地塌可“垫”！

原始文化表明了人类早期精神发展的最高成就。黄河流经的黄土地带，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中国古老文化的摇篮，距今约七千年的仰韶文化就孕育在这个摇篮之中。仰韶文化以彩陶为特色，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就是其中的精品之一，显示着这一历史时期的灿烂夺目的文化成就。如遗迹中有一尖底瓶，打水时可自行歪倒灌满，巧妙地利用了重心原理；而上面的纹饰告诉我们，半坡人已懂得计算，并有了等边三角形和平行四边形的概念。另外，彩陶上还有人面鱼纹、蛙、羊等多种纹饰，生动形象，在中国美术史上受到特别青睐。制陶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使人们可以根据烹饪、食用、储水和日常生活的实践需要，制造出适用的器皿和工具，这对改进生产条件，扩大生活领域，推动生产力水平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尤其彩陶把实用、审美、计算等智慧融为一体，这是人类自身生活质量和审美需求的提升，反映了当时的人类对人自身的认识又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还有特别引人瞩目的就是在半坡彩陶上刻有22种文字符号，研究中国文字的有关专家认为这是中国方块汉字的雏形，从而证明方块汉字已有六千年左右的历史。文字的出现是人类确认自身创造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的有力证据，文字是文明社会的符号，它标志着人类开始走出了蒙昧。

劳动使经济形态不断向前演进，人类已经成为地球上的万物之主。人类在生产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他们不仅能够结网捕鱼鳖、张网捉鸟兽，而且还能从艰辛的追捕狩猎中获得对自身以及对自然的许多认识。他们捕捉到的活物一时吃不完，就渐渐畜养起来，积久渐多，野兽的野性渐渐减退，脂肪消耗减少，肉味也特别腴美，有的还生了小兽。其中马、牛、羊、鸡、犬、豕最受人们喜爱，因而成为流传至今的“六畜”，这时的人们也由以狩猎为主而进步到以牧畜为主的伏羲时代，

人类摆脱艰辛、回避危险的自我保护意识也有了提高。动物养多了，人也就不可能再栖居树巢和洞穴了，于是盖起了大大小小的房屋及猪圈、牛栏、鸡埘、马厩等。《诗经》中有一首诗描写当时人们快乐生活的情景：太阳要落山了，牛儿下山了，羊儿下山了，鸡也上埘了。因为猪繁殖快，肉又好吃，便家家喂养。所以，汉字的“家”字下面就有个“豕”字。半坡遗址中发现许多幼小的猪苗，证明是被人饲养的。

人类的智力、记忆力、数字概括能力和观察推理思维能力无不在生产劳动中得到锻炼和提高。早在野蛮时期，人类就已学会了结绳记事，随着生活复杂程度的提高，结绳已经不够，人们便采用长短线条的记号来代表事物，这就成了后人说的伏羲“八卦”，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文字的先声。同时，人们从野生植物中看到了野谷落到地上的种子春来又生、秋来结实的现象，悟出了栽种的道理，于是使用石斧掘土播种，后又发明了石锄石犁，这样便渐渐地进入了农业社会的神农氏时代。培植了“稷”的人功劳很大，便被尊为“稷”神，各部落首领都祭奠他，希望获得丰美收成。在代表长江文明的河姆渡遗址中，就发现了大量农具和水稻。商业也随着农业社会的到来而出现。食物品种多了，各种工具也多了，人们便有了为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交换的要求。经过很长时间后，人们发明了钱币——“贝壳”，因当时贝壳美丽易携，故人人喜爱。劳动不仅促进着生产和交换的发展，推进着社会的进步，劳动还改造着人类的体格和大脑，使人类逐渐地强壮和富有智慧。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人不仅要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精神产品的生产，人还要从事第三种生产，那就是要不断生产生产者——即人口的繁衍。在这方面，婚姻家庭制度的变革是促进人类自身进化的最重要的条件。

文明人类的婚姻家庭制度是由原始氏族婚姻制度演变而来。恩格斯指出，当氏族告别了蒙昧时代，“到了野蛮时代低

级阶段，它便达到了全盛时代”^①，这里的氏族指的是母系氏族。有学者认为：“约在距今一万年前，我国便开始转入了氏族制度全盛时期”^②，这大概是可信的。人类摆脱野蛮时代，尽管首先有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方面的标识，但最需要提及的还有婚姻制度的改变。本来，原始人群过着群婚生活，没有固定配偶；到了氏族社会，血缘家族是第一个社会组织，按辈婚配；到了智人时代，变成了一个氏族男女分别和另一氏族男女对应婚姻，排除了父母子女之间的性关系，这是人类家庭组织的“第一个进步”，“第二个进步就在于对于姊妹和兄弟也排除了这种关系”^③。为什么这是一种进步呢？恩格斯接着说：“不容置疑，凡近亲繁殖因这一进步而受到限制的部落，其发展一定要比那些依然把兄弟姊妹当做惯例和规定的部落更加迅速，更加完全”^④。也就是说，血缘关系越远，越利于人类在体格和智力上的发达。可见，在家庭组织结构上，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和对种族繁衍的认识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而不断地提高。不过，那时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于是就跟随母姓形成母系，同母子女便是同一个氏族，所以称为母系社会。如我国最早的姜、姬、姒等姓都是女旁，就明显地透露出古代母系氏族图腾的信息。但是到了牧畜时代，各族抢夺水草栖地，经常引发战争，男子作用大显，往往被推为首领，女人却因生产和生理关系，常常成为累赘，地位一落千丈，这样，母系社会便逐渐让位给父系社会，这是大约五千年前的事。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那时，我国氏族部落先后都转化为父系氏族公社，其特征是生产水平和社会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农业和手工业逐渐分离，冶铜业已经出现，交换关系进一步扩大，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8页

②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第1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5页

些都是父权家长制家庭促使原始氏族公社趋于解体的物质基础，尤其是在邯郸遗址中发现了水井，这很重要——它表明了当时人们已可较自由地选择栖居地和生活环境，不一定要在河边居住了，这是人类保存自身和改善自然在认识上的一大进步。

古人的葬俗也能客观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的发展变化。如在葬俗方面，母系社会的合葬和男女分工的葬俗到了父系社会就基本上消失了，出现了单人葬，且男子随葬生产工具，女人随葬纺轮。可见当时男女分工的状况：男子在社会生产部门中占主导地位，女子则以家务劳动和副业为主，在家庭经济中占从属地位。在男女合葬中，陕西龙山文化遗址中已表明是一夫一妻制或男子拥有妻妾。在甘肃武威还有一墓，一男二女合葬，男子居中直身仰卧，二女分别在左右两侧屈肢面向男子。可见，男尊女卑观念和奴役妻妾现象也出现了。这表明，随着原始社会的崩溃，“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①。

按照恩格斯的说法，男女不平等现象的出现，预兆着人类历史上第一种不平等社会制度——奴隶制度的到来，因为奴隶社会就诞生在父系氏族的胚胎里。果然，在父系氏族时期的墓葬中，如河北龙山文化就发现了一个废井里埋有10具尸骨，身首分离，作挣扎状，可能是战俘或奴隶，或被当作祭祀的牺牲品。可见阶级的分化已经非常明显。需要一提的是，这时有许多墓葬出现了大量随葬品，南京曾发现有一墓棺，随葬的玉璜、玉块、玉骨、玉坠、彩陶等多达32件，这表明私有财富已经大量出现，人类已经跨到文明时代的门槛了。

关于这一时期的资料，我国古代文献记载相当丰富，我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3页